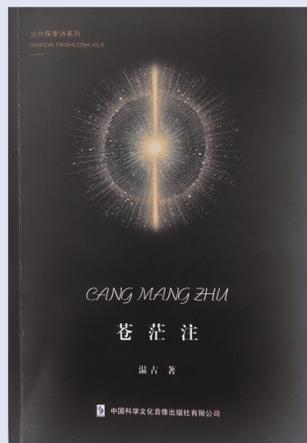


佳作赏析

# 洞幽贯冥 泰志适情

## ——论温古新书《苍茫注》的诗歌意境

● 张文静



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揭示了诗歌在情感链接、社会认知、交流共事与伦理化中的多重社会功能。当代也总有这样一些诗人，当他们独坐于幽室庭院或山水之间，心灵便能与天地相通，思绪可以无边际地蔓延开来，抒怀胸臆，浅吟低唱，豪情壮志、情景交融、物我两忘。品读诗人温古的新书《苍茫注》不禁令我思绪万千，感慨良多。

在温古先生的诗歌表达中有个突出特点，即情归于理，世间万物之理又将个人情感融入更为浩渺的宇宙之中，通过精神思想的超越而非情感的满足宣泄来使情绪复归于恒定与平常，指向的就是这种物我交融而物我两忘的超越境界。在温古新书《苍茫注》第二辑《沿着纸页的阶梯进入蜀河镇》组诗“听古人讲述”里：“他们的话，被时光翻译成了实物/一条河讲出了那么多的波涛/一条河说出了那么多的航运、沉没/秦岭和大巴山，他俩也在唠嗑/讲出了那么多的风云暴雨冰雪/以及雷霆、闪电和动植物的故事/讲

到风云的时候，痛哭流涕地下了大雨……放下吧，那些沉重的话题/像河流放下那么多的大石头/我一下子轻松了/恍然推开一扇古庙的门/和当下的阳光撞了个满怀”。诗人用情理之中的跳跃式语言完成了一场思想境界的超越之旅，不仅解读世间万物的自然规律，也隐喻人的一生活几个阶段：满怀豪情的青年，风云激荡的壮年，释然恬淡的暮年。温古先生以看似克制的平实文字描绘出了内心的波澜起伏及所思所想：我们终将走向通达，与世界和解，与自己和解，走向“阳光”。

黑格尔指出文艺以感性形象显现精神真实，是理念的感性表达；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中指出，文学的生命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脱离传统便如无源之水。这些经典论述从不同维度揭示了文学作为文化精神载体与传播媒介的根本属性，其发展始终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温古先生的诗歌从文化传承到独创文本，跨越藩篱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系，以新形态独善其身。他的诗歌所承载的深厚底蕴、人文关怀与理性精神，渗透至广泛的文化实践之中，从个体的情感表达升华为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切思考与延伸。在第二辑《沿着纸页的阶梯进入蜀河镇》组诗“离开蜀河镇”中：“一块秦砖，砌在墙里/你不能搬动，那是《史记》中竖排的方块字/一个鼠洞，你不要掏/那是《二十四史》中的一个句号/它通向两千年前古人生活的暗角……”。温古先生用极致而浓缩的语言由小见大、由大寓精，收放自如，行云流水般地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融会贯通的文化实践功力。

苏轼提出关于对待外在事物态度的美学命题“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圣贤“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君子无不可”，君子能像水一样随物赋形，能屈能伸，便是符合“道”的。在第三辑《曼德勒岩画》组诗中：“黑色的岩石上，雨珠碎裂/青色的

岩石上，星星一滴一滴洒落/一千年、一万年，古老的风在唱：一万个、一万个，相似的夜晚/别问我祖先们的秘密/闪电已经刻在了石头的脸颊上”“一万年，光阴被天空静静地吸走/只有巴丹吉林的流沙/跟着驼队，能走出洪荒/今夜，如果我睡着了/明天刨开沙土，我就是一根/埋得最深，最黑的肉苁蓉”。温古先生用极具张力的想象体悟世间万象，大跨度的语言完成了他雄浑的语言风格的架构。阮籍《清思赋》描述虚以纳物的状态，“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逸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温古先生对世间万象的神物来集、洞幽贯冥，以及他冰心玉质、恬淡无欲的性格品质，铸造了他诗歌审美超然的成就和无以复制的宏阔境界。温古先生“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随物赋形，能屈能伸”且收放自如、行云流水，真乃一副君子的文风与作派！不仅如此，温古先生的诗歌在文化认同建构、价值引领与文明对话中发挥着作用。

诗歌始终是温古先生的生命追求，从而也导致他的诗具有田野调查式的写作特点和在地性的美学风格。成为一种承载着生存智慧与道德秩序的文化密码，诗人在城市与乡村的地理切换中，始终以朴素而充满张力的语言校正精神的坐标。在第四辑《哈岱高勒露天煤矿的诗歌档案》组诗中：“凝重，威武。当他们从矿井里走出/一列行动的雕塑挺进着/那工衣的折痕和脸上的轮廓/呈现铸铁的坚硬和岩石的光泽/阳光的精神/任时间都无法打磨”“比如喜马拉雅山顶的积雪/炉膛里燃尽的灰，比如老矿工的白发/再加上亿万年的沉埋/站在大地的最深处/才能说出，矿工的海拔”。这些带着时代温度的细节，不仅是他多年煤矿工作个人记忆的打捞，更是对经济变迁、奋斗一角的诗性记录，具有超越个人经验的历史纵深感。这种基于真实工作经验的创作，以有节制的笔触抒发社

会关切如何重塑生命价值的赞歌。诗人完成对劳动者的诗性诠释——它不是单向的情感赋予，而是生命之间的相互精神滋养。这种将具体劳动升华为道德秩序的描写，体现了社会伦理赋予的结构视野，具有一般诗人难以触及的境界。

温古先生的诗歌也具有绚丽而魔幻的光谱，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浓缩着可以用文字表达的所思所想。从恣肆汪洋的寓言、纵横捭阖的史论，到雄浑雅健的纪传，诗人担负着重重抱负，又始终在“言志”与“抒情”之间穿行。其中最有力量的篇章，无不是从“我”出发，再通向辽远天地。说到浪漫主义色彩，温古先生的很多诗句又充满绚丽魔幻的想象，在《杏树上的喜鹊窝》中：“你简陋的阁楼/曾挽留夜行的流星/过夜/月亮是你府邸的常客/是啊，你是农人的好邻居/和他们一起，平静中/将毛茸茸的日子孵出了窝”。浪漫之余，诗人又常常会将清丽的词藻融入雄健的语境里，在《布谷声声》里：“从《诗经》里找，从《楚辞》里找/从《全唐诗》里查这个词的出处/布谷、布谷/的声音/水珠一样敲击我的耳鼓/王维从一首唐诗中转过身来/像‘漠漠水田飞’过来的一只‘白鹭’/说，布谷是仄声韵/是叫醒万物起床的声音”。诗人从“我”的感知出发抒情，将视野打开通向辽远天地，给予读者无限想象的可能。

温古先生数十年可谓著作等身，殊矣无数，在此不一赘述。当我再次拜读先生大作，时而拍案叫绝，时而感同身受。他或以历史与现实对话，展现学者型诗人的思想锋芒；亦或用词诡谲瑰丽，超乎常人思维，彰显大家风范的修养气度。最后用先生诗中语句结束我有感而发的浅薄论析，在《峡谷里听泉》组诗里诗人写到“多深的泥土/能接近它们的思想？/多深的路，能追上它们行走的根！”诗人用“檀子松”寓意文学之路，吾将上下而求索！

人类及其事物的最大力量”。比起记录“有什么”“做什么”，苏莉更在意的是“如何感受”“如何思考”，苏莉绘制的是一幅充满温度和精神力量的文化地图。

### 民族志

苏莉的作品不仅承载了对自然地理与人文风貌的描摹，更通过对女性日常生活的细致记述，为没有文字的达斡尔族保存了重要的文化传承与集体记忆，具有民族志价值。

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民族志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这种变化的动态过程，以及文化如何塑造和影响人类的行为和思想。”通过民族志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苏莉长期致力于达斡尔族与莫力达瓦的文化叙事建构与民俗研究，并以自己的影响力，持续推动族群历史经验与社会记忆的呈现。“对于生长在一个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我试图使用汉语重建属于我们这个小小族群生命的和文化记忆的尝试。以便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一些线索、一些小小的路标……”

在传统民族志的叙事结构中，女性往往被隐身、被遮蔽，或者作为男性的附属，或被简化为固化的文化符号，从而消解了其作为历史参与者、见证者与意义承载者的价值。民族志的女性书写并非简单的“女性写的民族志”，而是一种以女性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性别视角为切入点，关注女性生活经验与文化实践的研究路径，并将女性日常生活经验作为重要的知识来源。苏莉记录了女性的故事，呈现了女性视角，她关注女性经验、创新书写方式，让那些被忽视的声音得以被听见。

苏莉以文字为经纬，为其故乡绘制出一幅幅蕴含情感温度、生命律动、历史痛感与文化韧性的精神图谱。她记录了莫力达瓦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文化历史，以及生活于其间的达斡尔人家的日常生活、亲情故事、代际关系、民族身份、个体意识、语言环境以及有关地域文化的思考。

莉耳濡目染一代代达斡尔族女性面对生活的勇气与担当，她们从不怨天尤人，也不会被命运压垮，她们天生具有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的能力。哪怕琐事缠身，也会在原野上尽情舞蹈。苏莉笔下，一代代达斡尔族女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劳作、繁衍，生生不息。

### 地方志

苏莉的散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方志体例，而是通过散文的形式，完成了一种“情感的地方志”“记忆的地方志”与“身体的地方志”的构建。传统方志关注宏观、政治、经济，苏莉将笔触深入大江边、山林里、稠李子树下、柳蒿芽中……她书写奶奶与母亲口耳相传的故事、稠李子木制作的摇篮、食物的味道、哈尼卡的样子，以及对故乡风物的情感，这本身就是最鲜活的地方志。散文同样可以承担记录地方、传承文化的“志”的功能，是文化存续意义上的“地方志”。文学丰富了地方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表达，为读者提供了更加鲜活的地方体验。这种方式能更好地传承地方历史的同时，也展现了地方特有的社会面貌与人文情感。

苏莉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写母亲的端午节故事，写人间烟火。她记录了生活在此地人们的信仰、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学。莫力达瓦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苏莉创作的母题。她的作品大多围绕这片土地展开，记录了达斡尔族的生活细节、风土人情，以及文化的传承发展。如果说地方志是“史”，苏莉的文字就是有情、有温度的“史”。苏莉的书写保留了这方水土的完整记忆。让故乡，让莫力达瓦从一个地理名词，成为了一个可以被感知、被理解、被铭记的文化家园。

在写作中，苏莉完成了自己的还乡之旅。距离给了她回望故乡、回望莫力达瓦的时间和空间。莫力达瓦之于苏莉，是身份认同、文化基因和情感归属的源头。“自然环境决定了人类的行动和生活形态，或许也是改变作为生物的

文化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共生，多元一体才能构筑绚丽多彩的文化。达斡尔族作家苏莉多年来试图用文字重建记忆中的故乡——莫力达瓦，从《旧屋》到《天使降临的夏天》《万物的样子》，再到《生于莫力达瓦》，苏莉完成了精神上的归乡之旅。她以女性视角和声音所打造的文学世界，展现了达斡尔人赖以生存的栖息之地与精神家园，也开启了达斡尔族女性方志的时空。

### 女性志

在苏莉的笔下，地方记忆不仅是历史的再现，更是女性在地域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传承的生动体现。《生于莫力达瓦》的出版，打破了传统方志以男性视角和宏大叙事为主的模式，转而关注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和微观历史。苏莉的创作超越了单纯的风物记载，深入到达斡尔族社会生活的肌理之中，尤其通过聚焦女性的日常经验，为这个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的民族，构建了一份鲜活而立体的文化档案，保留了其文化身份与文化记忆。

达斡尔族女性，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除了家务，她们种植烟草、晒制黄烟，制作皮靴，缝制手工艺品，以此来贴补家用。善良、聪慧、隐忍、宽容与担当，是一种深植于乡土社会伦理结构中的文化基因，也内化为苏莉个体生命经验中鲜活的成长记忆。这些品质在具体而微的日常实践中，在代际传递的情感互动中，逐渐被赋予意义与形态。苏莉所经历的“自在生长”，实质上是这一伦理生态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具象化实现——它既承载着文化传统对人格模式的隐性塑造，也体现为个体在接纳与转化中所完成的主体性建构。女性群体所提供的情感滋养与价值示范，不仅缓冲了外部世界的结构性压力，更在潜移默化中奠定了自我认同的根基，使文化基因得以在代际延续中同时保持着生命力。

从奶奶、到母亲，再到姐姐们，苏



分享悦读

2026年年初，长篇小说《富甲天下大盛魁》首发式现场，编剧、作者梅锋以一句“我们永远需要一个好故事”，道出一部作品、一群创作者、一段商业传奇跨越十余年的坚守与回响。从剧本到小说，从杀青到面世，从荧屏到书页，《大盛魁》用漫长的等待，证明好故事从不畏惧时代流转，更不会被岁月埋没。与梅锋搭档作者王路沙因有事没有出席首发式。

《大盛魁》之于梅锋，是出道即巅峰的起点，也是改写人生的际遇。作为他编剧生涯的第一部作品，剧集凭借扎实叙事与厚重底蕴收获高口碑，更让这位祖籍江苏的北京青年，与内蒙古草原、与塞上商道结下不解之缘。在王新民导演的引领下，他与搭档王路沙并肩创作，一个擅长宏观架构与本土历史，一个深耕社会学与文学表达，优势互补，将三百年旅蒙商传奇落地为有血有肉的故事。电视剧杀青之时，小说初稿同步完成，原本计划影书同步问世的美好愿景，却因播出延宕，迎来了长达十年的等待。

十年间，世事更迭，影视与出版生态风云变幻，短视频、短剧冲击着传统文艺形态，无数人质疑纸质书与长故事的未来。但梅锋与团队从未放弃，他们在各自道路上沉淀成长，从青涩青年蜕变为成熟创作者。2023年，电视剧终于登陆四大卫视与网络平台，热度与口碑双丰收，为小说出版铺垫。团队没有将书稿仓促面世，而是对旧稿大幅精修，将三部曲调整为契合剧集结构的上下两册，完成从影视艺术到文学文本的深度转换，补充影像未能尽述的细节与情怀，让这段传奇以更完整、更细腻的姿态走向读者。

在快餐化阅读盛行的当下，为何还要坚守长篇创作、坚守纸质书写？梅锋给出了坚定答案。人类文明始于篝火旁的故事传承，对好故事的渴望早已刻进文化基因，媒介形式更迭，从未改变人们对真诚叙事的追求。《富甲天下大盛魁》的珍贵，不仅在于还原大盛魁的商业奇迹，更在于它写透了普通人的奋斗与成长。王路沙的迷茫、史大学的内耗、张杰的洒脱，映照出当代人的生活百态；三兄弟从草根起步，在挫败中坚守，在困境中突围，藏着跨越古今的精神共鸣。

这不仅是一部讲述“富甲天下”的商业书，更是一部书写人心与坚守的成长史。它传递的不是投机取巧的致富术，而是以义制利、以诚兴业的商业哲学，是平凡人找准方向、脚踏实地，终将在时代长河中留下印记的人生信念。王新民影视工作室二十余年深耕大盛魁IP，梅锋、王路沙十余年打磨文字，这份执着，本身就是对“工匠精神”最好的诠释。

篝火未熄，故事常青。《富甲天下大盛魁》的出版，是一段创作征程的圆满，更是一段传奇的新生。在流量与快节奏裹挟的时代，它以厚重与真诚提醒我们：文字有力量，经典有温度，人类永远需要一个能安放心灵、启迪人生的好故事。而那些耐住寂寞、用心讲好故事的人，终将被时光温柔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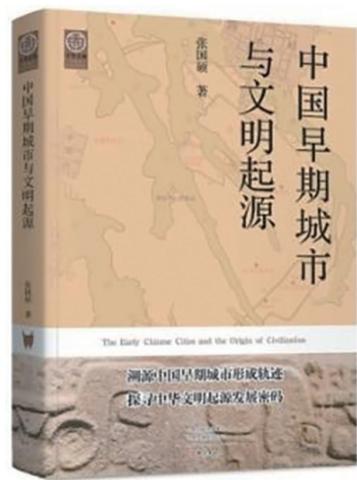


新书架

## 《中国早期城市与文明起源》

张园硕著

大象出版社出版



本书通过溯源中国早期城市形成轨迹，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密码，探讨早期城市与文明要素形成的关系。

(据《人民日报》)



书评评点

# 一幅充满温度和精神力量的文化地图

## ——评苏莉的散文创作

● 杨青

文化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共生，多元一体才能构筑绚丽多彩的文化。达斡尔族作家苏莉多年来试图用文字重建记忆中的故乡——莫力达瓦，从《旧屋》到《天使降临的夏天》《万物的样子》，再到《生于莫力达瓦》，苏莉完成了精神上的归乡之旅。她以女性视角和声音所打造的文学世界，展现了达斡尔人赖以生存的栖息之地与精神家园，也开启了达斡尔族女性方志的时空。

### 女性志

在苏莉的笔下，地方记忆不仅是历史的再现，更是女性在地域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传承的生动体现。《生于莫力达瓦》的出版，打破了传统方志以男性视角和宏大叙事为主的模式，转而关注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和微观历史。苏莉的创作超越了单纯的风物记载，深入到达斡尔族社会生活的肌理之中，尤其通过聚焦女性的日常经验，为这个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的民族，构建了一份鲜活而立体的文化档案，保留了其文化身份与文化记忆。

达斡尔族女性，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除了家务，她们种植烟草、晒制黄烟，制作皮靴，缝制手工艺品，以此来贴补家用。善良、聪慧、隐忍、宽容与担当，是一种深植于乡土社会伦理结构中的文化基因，也内化为苏莉个体生命经验中鲜活的成长记忆。这些品质在具体而微的日常实践中，在代际传递的情感互动中，逐渐被赋予意义与形态。苏莉所经历的“自在生长”，实质上是这一伦理生态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具象化实现——它既承载着文化传统对人格模式的隐性塑造，也体现为个体在接纳与转化中所完成的主体性建构。女性群体所提供的情感滋养与价值示范，不仅缓冲了外部世界的结构性压力，更在潜移默化中奠定了自我认同的根基，使文化基因得以在代际延续中同时保持着生命力。

从奶奶、到母亲，再到姐姐们，苏